

## 南方澳漁村社區中新移民女性的參與式設計

林佳禾<sup>1</sup>

新移民女性，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外籍新娘/配偶」，在台灣已經逐漸成爲一個新興的族群，她們在台的生活適應也變成近來非常重要的議題之一。2006年，三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研究生，以社區實習課的名義進入著名的南方澳漁村社區，協助成立一個新移民女性的社區服務據點。

這是一個關於社區參與如何處理族群和文化差異的個案，我們試圖藉此探索設計或規劃如何處理後現代的差異政治，並進一步實踐草根民主精神中「多元文化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理想。

###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

在台灣，外籍新娘意指透過婚姻關係自東南亞嫁入台灣的女性，近年來數量明顯成長的中國大陸女性，也被包括在內。這種婚姻關係多半是透過婚姻仲介公司的安排，台灣男性可以挑選自己中意的女孩，並且在經過一連串冗長的官方程序，包括登記、審查、面試之後，才得以將其帶回台灣，時間前後甚至可能長達一年以上。

這樣的「新娘貿易」或說「商品化跨國婚姻」的現象，並不只發生在現今的台灣與東南亞之間。就如同西方國家曾經一度流行的「郵購新娘」，這和不均衡經濟發展所導致的人口推拉的流動現象有密切的關係。自從1980年代以來，台灣逐漸增加的外籍新娘人口，應該被視爲台灣與東南亞之間逐漸浮現「半邊陲-邊陲」關係的結果（夏曉鵬，2002）。

90年代以後，我們可以說台灣社會裡的外籍新娘人口有比較顯著的成長。與80年代不同的是，早期始自客家農村裡客家男子前往印尼迎娶同有客家血統的華人女性；到了90年代中期轉變爲以「乖巧順從」爲號召的越南新娘爲主流，同時迎娶外籍新娘也不再只是客家庄或農村的專利，而變成在地域上更爲普遍的現象。近年來，則是同文同種且沒有語言障礙的大陸新娘人數急速增加，至今已達到所有外籍配偶總人口的三分之二。

截至2007年四月底止，台灣地區外籍配偶的總人口數爲363,573人。台灣社會現在對這個新興族群投注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爲了表示尊重，目前傾向皆以「新移民女性」稱之。

---

<sup>1</sup>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E-mail: [jiahe.lin@gmail.com](mailto:jiahe.lin@gmail.com)

排名	縣市	外國籍	大陸（含港澳）籍	總數
1	台北縣	20,423	46,549	66,972
2	桃園縣	13,283	23,700	36,983
3	台北市	7,748	28,576	36,324
4	高雄市	5,909	18,119	24,028
5	台中縣	8,259	13,576	21,835
∴	∴	∴	∴	∴
17	宜蘭縣	2,573	3,357	5,930
∴	∴	∴	∴	∴
全台總計		125,439	238,134	363,573

註：以上數字統計自 2007 年四月底止。

## 新移民女性在南方澳

宜蘭縣位於台灣東北部，多年來以優良的環境品質被認為是全台最適宜人居的地方，在地的第二級和第三級產業發展相對並不發達，因此人口數始終穩定維持在 46 萬人上下。相較於其他縣市，宜蘭縣的新移民女性人數也並不算多（見表 1）。然而，有別於其他地方，宜蘭縣內新移民女性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並非是主要的都市，而是一個人口不及萬人的漁港—南方澳（見表 2）。

階層	新移民女性人口	總人口數	%
台灣地區	363,573	22,886,902	1.6
宜蘭縣	5,930	460,265	1.3
蘇澳鎮	1,078	43,136	2.5
南方澳	362	8,917	4.1

註：以上數字統計自 2007 年四月底止。

南方澳是目前全台灣最大的漁港之一，行政區上它是隸屬於蘇澳鎮底下的六個里。南方澳的發展歷史不長，直到日據時代晚期，才由日本人計畫性地開港移民。

<sup>2</sup> 資料來源：內政部網站 (<http://www.moi.gov.tw>)。

<sup>3</sup> 資料來源：內政部網站 (<http://www.moi.gov.tw>) 及宜蘭縣蘭馨婦幼中心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台灣漁業技術改良且急速成長，南方澳也變成吸引許多城鄉移民的淘金之地。在 1960 年代極盛之時，這個僅有 2.5 平方公里的小土地上，曾經聚集了高達 2 萬 5 千人的口（蕭銀河等，2004）。

然而 60 年代以後，當台灣經濟起飛，漁民收入不再特別突出，加上漁業本身的高風險性讓年輕人怯步；另一方面，漁獲量也因為前段時期的過漁行為而開始衰退，台灣漁業乃逐漸開始走下坡。即使在南方澳這樣的大漁港，雖然現在多數居民仍然從事漁業或週邊相關產業，但城市衰敗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現今南方澳漁業的底層勞動力已經高度倚賴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外來漁工（合法非法兼有之），當地老一輩的漁民幾乎不會再鼓勵自己的下一代繼續從事漁業，年輕一輩稍有能力者通常選擇出外謀生。留在地方上的人多半被視為各方面能力條件較差，在這種婚配條件不佳的情況下，他們往往便會選擇透過仲介來「消費」一場跨國婚姻。這就是為什麼南方澳會有高比例的新移民女性的原因。

初期南方澳的新移民女性主要來自印尼或菲律賓，現在則是以越南和中國大陸佔大多數。就統計上來說，毫無疑問地，南方澳有最高的新移民女性比例，大約是全宜蘭縣平均值的三倍左右。

南方澳居民組成的多元性並沒有隨著經濟衰退而減少，相反地它甚至因為這些新加入成員（包括移工和新移民女性）而增色不少。走在南方澳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外來漁工騎著腳踏車來回穿梭，隨處可以聽到年輕婦女抱著孩子用多種不同的母語談天串門子。在每一家行動電話通訊行的門口，一定可以看到「電話卡：打東南亞最便宜！」之類的廣告標語。就日常生活的地景而言，南方澳絕對是全宜蘭縣最國際化的地方。

## 「他者」的處境

絕大多數南方澳的新移民女性，幾乎毫無例外地，在日常生活中要面對兩大關鍵課題：「生育」和「生計」。

對於大部分的傳統台灣家庭而言，娶一個外籍新娘進門，首先無非是希望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這說明了為什麼新移民女性的生育率較一般台灣女性高。她們往往在嫁到台灣的最初幾年內就會懷了第一胎，而且最後通常都不只有一個孩子。南安國小是南方澳唯一的小學，目前全校 488 位學生當中已經有 89 位，也就是將近五分之一的比例，是新移民女性的第二代（也就是所謂的新台灣之子）。再一次地，這個比例也是全宜蘭縣所有學校中最高的。

另一方面，多數家庭通常都樂意見到新移民女性出外工作賺更多的錢；更何況，即使是新移民女性自己，不少人對於家鄉的娘家也都還有著負擔經濟的責任，因此她們本身工作的意願是很高的。在南方澳，不論她們來自何方，來了多少，加入地方經濟是很常見的現象。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經營自己的小生意，諸如飲食店、檳榔攤、美容院等等；大部分人通常在海鮮餐廳裡做兼職工作（特別是在週末假日），或者從事一些修補漁網、餌料或食品加工、小手工等零工性質的工作。

這形成了南方澳新移民女性生活裡的雙重壓力，最終導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台灣的移民政策對所謂的「新移民」有許多限制。一個東南亞配偶需要花三年；一個大陸籍配偶則需要八年，才能夠取得台灣的身份證，得到完整的公民權利，而且她們必須要上滿至少 100 個小時的中文或生活適應課程。然而，對於南方澳的新移民女性來說，她們幾乎不可能規律地去使用這些社會服務。這使得她們要調適在台灣的新生活，甚至克服一些生活上的痛苦掙扎，顯得更為困難。

新移民女性，特別是來自東南亞的，無論她們原來的教育程度是高是低，總是會有無法充分使用中文或台灣話的問題，語言障礙使得她們往往被以文盲對待。人們總是會質疑她們不能夠獨立自主，或者無法好好教育她們的孩子。南方澳就像其他的漁村社區一樣，男性因為出海或出外工作，在家庭中的角色往往是缺席的。南方澳單親家庭和隔代教養家庭的比例確實較一般為高，但是當這些家庭的母親是新移民女性時，她們往往被會得到更多的責難。普遍印象中總認為新移民女性缺乏責任感、對於夫家不能齊心，甚至有些人會認為新移民女性逃家的可能性比較高，所以她們必須被好好「看管」或是「規訓」。這些種種，當然都是社會建構的偏見。

這些偏見從何而來呢？移民政策就說明了一切，它是台灣人看待新移民態度最真實的寫照。我們將所謂的技術或專業移民與其他移民區分開來，事實上是將這些來自經濟條件不如台灣的國家的仲介婚姻移民和契約勞工的身份重疊在一起，標識為「己所不欲者」。我們自視優越，認為這些人來到台灣都是為了經濟上的目的，又以語言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認定他們是較不文明的，因此他們應該學習並且順從和我們一樣的生活，舉措要符合我們的期待。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為他們只能接受恩惠，卻難以真正做出什麼貢獻。到頭來，他們始終只能夠做為「他者」，而不會成為「我們」。

## 打造「馨」娘家

2006 年二月起，我們來自台大城鄉所的一個學生團隊<sup>4</sup>，開始在南方澳進行田野調查，找尋發展關於新移民女性社區營造的可能性。一開始我們先後拜訪了地方政治領袖、漁會幹部、社區組織、地方文史工作者以及學校，然而，他們雖然也都感覺到新移民女性是一個需要注意的議題，絕大多數卻仍然認而相較於地方經濟和產業再發展的殷切焦慮，這並沒有那麼高的急迫性和優先性。幸好，後來我們得知政府在正推動一項在各城鄉市的層級廣設新移民女性社區服務據點的計畫，同時我們也結識了宜蘭縣的蘭馨婦幼中心，得知他們正準備透過這個計畫，在南方澳成立宜蘭縣第一個社區服務據點。

雖然蘭馨稱不上是南方澳的在地組織，不過他們長期在南方澳與學校合作，同時推動外展服務工作，已經有超過三年的時間。因此，他們所掌握的新移民女性社會網絡，比起任何一個地方團體都要更好。更何況，既然已經有一個正要進行的空間計畫了，我們很快地就決定投入協助這個社區據點的成立工作。

---

<sup>4</sup> 團隊成員包括陳虹穎、施佩吟以及我本人。

透過這個社區據點，我們希望能夠讓新移民女性走出家門並看見彼此。這個空間應該要表現她們的主體性，讓她們在此放下生活瑣事，徹底放鬆自在；這個空間更應該積極地扮演一個平台，讓她們能夠表現自己並且鼓動在地社區和她們之間的相互學習。這一切都要透過她們的參與式討論和行動才能達到，做為一個「賦權」的過程，我們試圖將一個由上而下的政府計畫，轉化成爲由下而巳的社區設計方案。

於是打造「馨」娘家的行動就此展開了。「馨」字與「新」同音，「馨」娘家也就是「新」娘家，說明了這個社區據點屬於所有新移民女性，就像她們在台灣的第二個家。

## 過程中的互動

展開行動的第一步，我們首先說服了蘭馨放棄在漁港碼頭旁租賃一個現成辦公空間的念頭，雖然這肯定是方便許多的做法。取而代之地，我們開始在社區鄰里中尋找可用的空屋，而且很幸運地，短時間之內就有了不少選擇。最終我們租下了一棟鄰里位置相當理想的兩層樓獨戶舊屋，而且租金只有我們原來預期的一半。

既然基地已經決定了，接著我們便開始透過大型活動來宣傳據點的計畫。在社區運動會和校慶園遊會上，我們加入蘭馨社工們的攤位，以互動式的建築模型讓家長和孩子們可以自由安排不同室內空間的使用方式，且和我們分享簡單的想法。在這之後，總算有比較多的人開始知道據點計畫，而且也能認出我們就是「幫蘭馨工作的那群學生」。

下一步，以蒐集新移民女性的生命故事爲名，我們造訪了不少新移民女性的家進行訪問。透過這個方式，我們更深入地認識了蘭馨的社區網絡，同時也一人接著一人，一團體又一團體地慢慢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社區關係。然而，經過幾次比較近距離的接觸之後，我們很快地發現了一些困難：（一）新移民女性內部實際上非常多元分歧。印尼的、越南的、中國大陸的，她們各自有自己的社交場域，而且並不需要常常來往。（二）新移民女性高度鑲嵌在各自的家庭中，大部分的社交生活往往發生在家門前的走廊下。不論到哪裡，她們總要帶著孩子，看著他們、照顧他們。只要孩子醒著，就幾乎沒有所謂的空閒時間。



圖：與在地新移民女性的互動（陳虹穎編輯）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嘗試了邀請印尼和越南配偶的小團體來到據點，請她們告訴我們更多在南方澳的生活經驗，試圖將空間經驗轉化成為對於一個公共空間更具體的想像。然而，得到的回饋並不如預期。唯一確定的是這個社區據點裡必須要有一個可以讓孩子們玩的遊戲區，而我們也很快地就討論出一樓的「半樓仔<sup>5</sup>」空間應該要重新改造成為一個兒童遊戲場。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些粗略的布局構想，我們想想和這些母親們進一步討論更細節的設計，但並不成功。

我們似乎遇到了一個參與程度的瓶頸，無法再更形深入下去。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讓這些新移民女性放下工作和孩子，對我們的方案有更多投入，這和我們想要進行參與式過程的初衷並不契合。為了突破這個困局，我們決定既然要讓母親們參與並不容易，不如就將目標轉移到孩子身上。因此我們進行了一連串的週末兒童工作坊，出乎意料地，這個點子非常成功。它不只減輕了媽媽們的壓力，而且也讓孩子們對於這個週末的新玩意兒感到開心。很多孩子每個週末都期待能夠趕快到「祕密基地」來，在這裡他們除了可以做功課、讀書、和朋友玩耍，而且還可以加入我們打掃房子和彩繪空間的遊戲。更重要的是，一旦孩子們來了，活動結束母親們就會到據點來接他們回家，因此她們同樣也有理由繼續前來並且感覺這個空間。到最後，果然也有幾位新移民女性在後來室內空間施工的過程中，協助了部分布置裝飾的工作。

<sup>5</sup> 「半樓仔」就是一般台灣傳統街屋中常見的夾層空間，意即俗稱的「樓中樓」。



圖：週末兒童工作坊與成果（陳虹穎編輯）

我們在夏天到來前完成了大部分的任務，而這個社區服務據點終於在 2006 年十月的時候正式開幕啓用。由於人力不足，目前蘭馨只能夠做到政府的最低要求，一個星期讓據點開張兩天。雖然蘭馨也計畫要招募在地新移民女性來據點擔任志工，但這顯然還不到時機，要走的路還長。然而，最近當我再次造訪據點時，確實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新移民女性會到這裡來小聚，儘管到目前為止，這個地方還是比較像一個服務導向的辦公室，而非一個女性公共空間。



圖：南方澳社區服務據點現況（林佳禾攝影）

## 宛若初生兒的參與階段

回顧打造「馨」娘家的過程，我們最常自問的問題不外乎是：「我們的參與行動失敗了嗎？」有些人會說這個計畫的資源仍然來自上層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蘭馨），而非出自於本地新移民女性的需要和意願，因此由下而上的參與運作效果不佳。更別說參與的成果似乎有些淺短，沒有人真正在討論公共生活和集體價值，其中大部分的新移民女性甚至可能連她們究竟需不需要一個公共空間都沒想過。

某種程度來說是這樣子沒錯。然而，如果單一種想像的理想行動模式可能用來評價所有的參與，那麼我們就再也不需要討論所謂參與式民主的不同階段了（Hester, 2005）。對大多數台灣的新移民女性來說，不論她們來自東南亞或者中國大陸，西方式的民主幾乎在她們的生命經驗中缺席，沒有人會天生就懂得如何為自己發聲。我認為對南方澳的新移民女性來說，目前還在一個宛若初生兒的參與階段。打造「馨」娘家的計畫，也許在長期來看，會是啟動她們參與生命週期的關鍵樞紐。

對這種初生兒的參與來說，沒有任何事是確定的，每一個可能鼓動獨立思考或行動的方法都值得嘗試。我們在兒童工作坊的成功經驗，提醒了我另一個非常成功的故事。南洋台灣姐妹會是台灣目前最有影響力的移民組織，在 90 年代中期，它最初以創立了全台灣第一個移民配偶中文班開始在南台灣的客家大鎮美濃紮根發跡，爾後逐漸衍生出諸如日間托育或者合作式支持性網絡等等的創新行動，用以滿足在地新移民母親與她們家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這些行動者總是鼓勵新移民女性培養自己的主體意識，並且組織她們成為集體組織中的核心成員。在 2003 年南洋台灣姐妹會這個組織正式創立之前，已經有近十年的努力，才終於培養出一小群新移民女性敢於在公共議題上行動發聲。如今，南洋台灣姐妹會已經是許多移民權利倡議聯盟的重要領導組織之一。

有意識地提供服務與支持，在持續的學習過程中保持陪伴，那麼對於社會賦權和參與式民主的實踐就有可能會成功。對於我們的實習課程來說，也許在這個實體空



間的營造過程中並沒有太多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就在地移民賦權的角度而言，我認爲我們在南方澳的行動，做爲一個漫長行程的第一步，是踩在正確的軌跡上。

### 參考書目：

夏曉鵬，《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第9集（台北：唐山，2002）。

蕭銀河等編，《蘇澳區漁會誌》（宜蘭：蘇澳區漁會，2004）。

Randolph Hester，參與式民主的生命循環階段（中、英），《台北國際社區規劃論壇論文彙編》（2005），pp. 558-575。